

N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ations at War



战争中的国家

——国际冲突的科学性研究

[美] 丹尼尔·S. 盖勒 [美] J. 大卫·辛格 著

鞠方安 金 萍 译

徐鲁亚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N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ations at War



战争中的国家

——国际冲突的科学性研究

〔美〕丹尼尔·S. 盖勒 〔美〕J. 大卫·辛格 著

鞠方安 金 萍 译

徐鲁亚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争中的国家 / (美) 盖勒, (美) 辛格著 ; 鞠方安, 金萍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9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13519-3

I. ①战… II. ①盖…②辛…③鞠…④金… III.
① 战争—研究 IV. ①E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4854号

Nations at War: A Scientif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y
Daniel S. Geller and J. David Singer 199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98 and reprinted in 2000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4-262号

书 名 战争中的国家

著 者	(美) 丹尼尔·S. 盖勒 (美) J. 大卫·辛格
译 者	鞠方安 金 萍
审 校	徐鲁亚
责 任 编 辑	康天毅 张延安
装 帧 设 计	陈 敬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杨庄, 邮编: 065000
开 本	710 毫米×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例)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何克勇

副主编 徐鲁亚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何克勇 赵曙青 徐鲁亚 秦亚青 游 斌

译者的话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便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西方人也讲：要和平，先备战。可见东西方都极其重视战争问题。而自古以来无论局部还是世界性的战争都的确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命运、文明的进程发生了复杂的重要作用，并依然在发挥着多元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就是翻译并出版《战争中的国家》一书的意义所在。

《战争中的国家》一书通过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解析战争中的国际政治关系。并从国家（制度）、二元结构和区域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将500多个研究结果做了归类和整合，这些结果都是对于战争的定量分析。战争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在阐释性的框架下，本书对两种基本的政治决策模型——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了研究；同时，本书还对伊朗/伊拉克战争（198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做了个案分析，以此作为对历史事件科学性的解读。本书在开篇阐述了最主要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战争的严重性，然后根据概括法则科学模式展开具体阐述。本书的结尾以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为背景，针对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预测展开论述。

本书对战争的分析 and 研究主要以系统、定量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论证和叙述，行文中通过多个维度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结语和归纳，进而形成一系列概率法则，并通过归纳对相关的过程和行为进行解释。如本书运用逻辑归纳的方式对伊朗/伊拉克战争（198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进行解释说明，其中使用了很多的专业术语、复合句以及相

关的实证数据进行描述、叙述和阐释。具体来讲，本书在行文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客观性。在阐述其观点的过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实例以及知名学者的研究结果或是观点，为其理论观点的分析和阐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理论性。相对于描述性的文章，本书旨在分析不同战争阶段的国际政治关系，因而行文的措辞、术语的使用都较为正式，整体结构严谨；3）句式复杂性。本书在进行科学论证的过程中大量使用长句和复杂句式，经常在一个完整句子中会有不同的句式杂糅在一起，如被动句式、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

基于上述语言和文本的特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以直译与意译为主，归化与异化相结合为辅的翻译策略。在文风上尽可能与《战争中的国家》一书原文保持一致，贴切传达原作者的意图。由于本书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翻译，是一项专业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很多术语、词汇、研究方式、分析阐释的叙述风格都体现了学术型文本的特质，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精确性，如“rank-ordered preferences”（优先排序）、“axiomatic principles”（公理原则）、“expected-utility theory”（预期效用理论）等等。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和研究，对已有固定统一翻译的研究术语，会尽量采用；对某些还未有固定统一翻译的术语和措辞，会根据语境的信息传递以及相关的研究结果作为文本互证，进行翻译和处理；对于长句、复合句式的翻译，会在忠实于原作者表达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中英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和特征进行句式的调整，力求通顺、流畅，具有可读性。

本书主要由鞠方安和金萍翻译。鲜于文雯和代丽婷参与了个别章节的翻译。基于学识和时间等因素，本书翻译中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期望专家学者们的指正。

鞠方安 金萍

2014年2月

总 序

当今世界热点地区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民族（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难题，被称为两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常常受到这两个问题的撕扯，尤其是前苏东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一些地区更是备受困扰。宗教和民族是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的重要因素，宗教对抗引发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加剧宗教对抗，从而引发地区冲突。这些冲突无疑给世界文明带来震荡和冲击，而宗教极端主义一旦与国际恐怖主义联姻，这种震动和冲击将是毁灭性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第三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世界民族问题逐渐与全球化过程、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民族国家建构、跨境民族、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国内族际关系等产生了共生、纽结和镶嵌关系。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多样性等特征，包括民族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多民族国家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跨境民族

问题等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民族关系史，也具有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解决我国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译、介绍和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是研究民族事务不可或缺的参考，把国外民族事务的国际经验与国内的民族政治事实结合起来，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民族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走出去”战略正在稳步得到实施，通过学术、教育、文化和商贸等，国人正以各种方式走出了国门。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达到8300万。另据估计，中国在海外的各类企业总计已达到3万多家。

今天，每当我们打开电视机，往往会听到许多关于热点事件的新闻报道。许多事件，无论发生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是令人悲哀的结果还是让人尴尬的过程，似乎总会涉及到我们中国人。从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局势骤变而引起的大量紧急撤侨，到俄罗斯驱逐大量中国工人或关闭华商集市；从24名中国公民在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域沉船丧生事故，到华人在北美洲遭遇124起抢劫事件；从多次发生在阿根廷的华人超市遭武装抢劫，到29名中国员工遭苏丹反政府组织劫持，我们看到，几乎在世界各地，涉及中国人的事件日益增多。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不禁会问：东欧、非洲的警察为什么总喜欢找中国人的茬？俄罗斯为什么几度驱逐中国商人？中国在非洲无偿地援助了那么多的建设项目，为什么还被指责为“新殖民者”？每年数千万的中国游客为欧洲、美洲带去如此巨大的收入，甚至为他们支撑起因经济衰退而疲软的旅游市场，为什么还得到不文明、不受欢迎的名

声？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像美国一样在很多地方成为被仇视、嫉恨的对象吗？美国有学者承认，美国人并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国外。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对外国了解吗？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许多遭遇和尴尬正源于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或全然无知或一知半解或以己度人。

为了借鉴国际学术界在民族、宗教与冲突方面的研究经验，深入了解他者的研究视角、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为了给“走出去”的国人提供一些系统而有效的信息，我们以“世界民族关系与问题研究译丛”为题申请了“中央民族大学重大科研项目”资助，并获得了批准。

针对书目的选择和确定，我们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后来发现，我们所选择书目已超出了“世界民族关系与问题”的范畴，因此，最终将译丛的题目定为《世界文明与地缘政治研究译丛》。

最后，我谨代表本译丛编委会的所有成员，衷心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领导，是他们的独具慧眼，使本系列丛书得以付梓出版。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挚友杨建国先生，是他向我们推荐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同时还要感谢在整个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对本译丛做出过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的各位朋友。

何克勇

2013年12月25日于北京莲花斋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概述 13

第二章 决策模型 32

第三章 战争频发国家 47

第四章 战争频发双方 69

第五章 战争频发地区 97

第六章 战争频发机制 113

第七章 个案研究：伊朗/伊拉克战争（1980年） 140

第八章 个案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 156

第九章 结论 189

附录1 数据库列表

附录2 参考资料分类表

导 言

战争在世界政治中实属罕见，但从未远离我们。此话怎讲？一方面，全球体系中主权领土国从拿破仑战争后的不足30个，到20世纪末变为将近200个；我们所知的无定向相邻国家在1816年约为400对，而今天约为18,000对。虽然我们认识到大多数战争发生在邻国之间，从而推测特定年份邻国交战的数量到1816年会减少为40个，而到1993年会变为317个。但这一猜测一点也不准确。自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180年里，有81年没有发生战争，而在其他任何一年中鲜有战争发生超过一次的。另一方面，75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造成共三千多万战士死亡，更别说在这种战争背景下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平民丧生了。

另一个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国际体系中成员参战的频率。在本书所涉及的时间段内，我们发现150个国家从未经历过国际战争，49个国家只经历了一两次战争，16个国家经历了三四次。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只有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埃及和土耳其在近两个世纪里参与了十多场战争。

但是矛盾之处在于，大多数国家不断在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当然，一旦战争爆发，危害是巨大的。战争不仅会无情地夺走战士

和平民的生命，严重摧毁其家园、农田、道路和工厂。战败国的领土往往被战胜国占领吞并，其财富也被没收。

2 尽管战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对战败国来说，代价尤为惨重，但人们力图避免战争发生的努力程度确是矛盾重重。用传统观点来讲即“欲求和平，必先备战”，备战的前提是震慑威吓潜在侵略成性的邻国，而非挑衅，鼓动甚至跟风。加大战争投入并非明智之举，这不仅会影响本国的财力、技术发展、机会成本，还会导致环境破坏、经济衰退、精神和道德沦丧等不良后果，战争几十年所造成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毋庸置疑，引起战争的原因来源于强烈的自我实现欲望，本书在讨论“战争频发双方”时会继续解释这一点。

无论如何，国家间战争的骇人破坏性是吸引众多学者研究这种人类致命活动的起因，我们也欣然加入了这一队伍。但是熟悉“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 简称COW）”项目的人可能会想，我们未免太过于野心勃勃了。的确，从项目的名称来看，社会科学家需要了解大量的战争相关因素后才能更权威地谈论战争的起因。除非我们能先于世界政治战争中的变动，提前预测到其发生的条件和结果，并根据其变化做出相应推测，否则随便对战争的起因下结论都是天真冒昧的。

这个观点似乎不言而喻，但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它屡次遭到违背。每个致力于探求“战争相关指数”的调查都由成千上万的研究组成，研究者希望或是声称能确认战争的动机、起因或是根源。除了强力的人为驱动去理解或阻止战争外，到目前为止从未有人想到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战争，我们不必为此惊讶。事实上，人们只是在上个世纪认为物理和生物科学的知识产权战略和观察程序与任何社会现象都密切相关。因此，有关武装冲突的文学作品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充满有趣又具煽动性的推测，这导致其在严谨的学术领域常常贴上“学说”的标签。

另一方面，布洛赫（Bloch，1898年）、索罗金（Sorokin，1937年）、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年）和赖特（Wright，1942

年)所做的开创性努力并非无果而终。这些学者帮助我们从孔多塞(Condorcet, 1794年)和巴克耳(Buckle, 1885年)的承诺中转换为以定量国际政治(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为标志的科学和平研究运动(Singer, 1968年)。如今,我们有600多篇基于数据研究的文章,它们主要来源于五大英语期刊和二十多本书。这些详细研究对世界政治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对武装冲突问题做了严格而系统的交待。再加上1963年到1964年期间,密歇根大学开展了“战争相关指数”(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项目,此项研究至今已在理论性定位、实质性焦点和方法论导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目前的研究正是从这种非单一的学问中产生的。我们的目标是结语和综合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而后尽可能一致地将其融入到对现代国际战争的解释当中。

一体化问题

任何人如果读过,甚至写过那种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杂志上刊登的述评文章的话,都可以轻易明白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虽然强有力的科学规范支持可再现性,但还是会受到很强的诱因而脱离再现性,这就是相似性。这意味着即使几项研究旨在测试相同的理论模式,但是常常又会不同。部分是数据和衡量的问题,研究者个体以不同的方式衡量相同的变量,观察世界的不同区域,关注不同的历史时期。此外,我们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假设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间的时间间隔不同,计算不同时间间距移动的平均数,利用不同的转型方式处理历史上异常的案例,并且假定预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可以加入到某些设计中,并在其他设计中得到增值。

由于难以找到不同研究的完全相似点或近似相似点,所以即使这些研究的结论都一样,我们也不能认定它们由相同的理论支持;即使统计结果大相径庭,我们也不能认定它们指向不同结论。在更多地依赖实

4 实验室实验 (Campbell & Stanley, 1963年) 而非历史实验 (Singer, 1977年) 的研究中, 我们会发现具有典型性, 而且居于更高层次的相似性, 处理其研究结果的坚实基础是日积月累而来的。事实上, 一系列名为元分析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逐渐形成, 大众对其效力和缺点的敏感性也与日俱增 (Wolf, 1986年)。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 最显著的尝试就是针对一系列进行清晰界定的研究, 对其统计结果进行明确地比较和整合, 其结果是利弊并存。但是随着科学世界政治运动的持续升温, 尤其是当我们更密切地坚持研究设计的历史实验类型时, 就可以期待再现性和相似性标准得到更多的关注 (Singer, 1975年)。到那时, 面对衡量、变量、实证域和研究设计颇为不同的方法,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需付诸于实践。更确切地说, 我们要做优秀科学家在一项调查的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我们努力钻研, 率先关注我们和他人对当下问题的了解, 密切关注我们指定问题的更高级别的研究, 并区分两种断言, 一种是依赖显现的智慧、民族精神或“扶手椅理论”, 另一种是在客观程度上依赖重复性证据。之后我们按照上述建议, 来继续确定以更系统的研究为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例如, 如果对某一地区和该地区社会形态或历史时期情况的研究结果不同于对另一实证域的研究结果, 且这种不同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可能不是很明显, 那么我们会详加考虑。

在这里, 我们的观点是唤起大众对科学方法最大的热情, 秉承严谨的作风, 再次做出直观的判断。在我们评估、尝试整合出基于数据文献的不同结果时, 肯定有清单, 列出供考虑的因素, 但在最后的分析中, 它只是一种判定。在做这种判定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回到了我们理论的偏颇之处, 当然, 这依赖于我们对所熟悉的大量文献的阅读、回忆和重解。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文献很大一部分是对历史轶事、政策性预感、现代时尚和对过去研究者举办的研讨会模糊回忆的模糊组合。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我们保持心中直觉的来源, 而后以真正质疑的方式继续评估; 只要我们将其置于文献正式模式旁 (不是为了经验的真实性,

5

而是为了逻辑的一致性），并对建立在数据之上的一般性进行检验（注意许多一般性都指向多个方向）。

影响再现过程的深层原因是性格、心情或者工作的直接动机。统计学家喜欢区分类型一和类型二的误差，这种差别在这里是密切相关的；在类型二的误差中，我们高估了能使我们看到可能不存在于经验事实中的模式的证据，而类型一的倾向更可能推断出随机性，从而忽略了一个有力但不明显的结构。原则上，两者都是要避免的，但我们中那些认为社会现象本是系统化、模式化和法制化的人，他们更偏向于科学方法，通常会在类型二的方向上出错。瓦斯克斯（Vasquez，1987年）在其人气极高的著作——《战争的步骤》（*The Steps to War*）中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就“战争相关指数”在联盟关系中的影响作了仔细调查，他还更为连贯一致地阐释了调查结果。另一方面，那些过于挑剔、不看好社会科学或是将国际史视为简单独立事件的人，往往会错过发现一系列有潜在意义规律的机会。我们之所以如此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是因为该卷的学术价值部分取决于如何严格、仔细并富有创造性地处理这项工作。

理论观点

至此，您对我们的方法论导向有了较清楚的理解，但理论倾向还鲜有线索。十年前，这会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讨论，但由于概念疏漏、语义不明和认识不足，这一理论很难站住脚。

在面对世界政治这一主题时，我们所有人都表现出规范化和实证的取向，而不可知论已趋向于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考虑到细小散乱、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我们明智地采取了这一观点，即理论流派中的某一观点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按照历史记录测试其种种指标。不同的是，我们中带有这一倾向的人强烈要求

对世界政治解释的冲突模式采取很开放的态度，并郑重承诺对支持它们的证据进行系统研究。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该领域走向了明显适得其反的方向（Singer, 1989年b^①）。二战后的十年里我们中的一些在读研究生全身心投入了那场“现实主义”对抗“理想主义”的辩论，而这场毫无意义和结果的辩论作为所谓严肃讨论的话题重现了。我们认为这一议题出自标志着美苏“冷战”开端的政策辩论。以英国的卡尔（E·H·Carr, 1939年）和美国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1949年]^②, 1967年）为代表的学者尖锐地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政策因为信赖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而成为天真的空想，他们主张更为强硬的马基雅维利理论（Machiavellian view）的国际政治观。这些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人有三个基本假设：（1）体系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并将保持下去；（2）政治家要以“国家利益”为考虑重心；（3）主导货币将会保持军事和产业的货币购买力。尽管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1953年, 1964年）等人的批评很有影响力，再加上超级大国对植根于“现实主义”政策的热衷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其中很多后果直到现在才显现出来，但一代代的学者还是对此一直辩论不止，这项议题依然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较量方式活跃在当代。

有几个原因可表明这一观点，第一个是语义原因。当然，我们可从多个方面观察这一视角，包括强权政治、现实政治、宏观政治和实力平衡等等。更本质地说，即使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能被称为理论，我们也得在阐释清楚后把他们的假设所带来的行为后果付诸实证测试，而许多随意传播这些说法的人迄今还没那么做。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而且很多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是针对种种相关推论的。总之，正是超越文献层面的辩论，为竞争模式和武装冲突假说的衔接和

① 指1989年版原著的b篇。下同。

② 原著首版年份。下同。

测试提供了契机。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进一步提出论据，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结语出使我们质疑“现实主义”范式内某些成分的因素。首先，它通常假定领土主权国家不仅是整个体系中最重要行动者，也是为国家实体期望效用因素所驱动的个体，而不是凝聚力不同的联盟——联盟的各个成员在内外政策相互作用中追求自身利益。其次，它假定整个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忽视制度、法律和实际约束系统；即使这些“制度”可以追溯到维也纳国会时期，但它们在本世纪末迅速扩张时绝不会消失。再次，它甚至无视安全决策时道德标准的作用；世界历史中满是这样的例子：道德禁忌减轻甚至避免了将会违反或是倾向于违反国内国际标准的举动。最后，它极少关注能力、正直、信用和合法的重要性，而这些都和物资力量相互影响，构成国家的实力。国家实力在此理解为产生影响和抵抗他国企图的影响的能力。

除了以上这几点，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政治和相关取向的理论意义。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两本优秀的文章集，明确而系统解释了这种意义——较早的有《战争相关因素II：现实政治模式测试》（Correlates of War II: Testing Some Realpolitik Models），最近的是《重组现实政治》（Reconstructing Realpolitik）。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使用正式模式的更具系统性的思辨文献，还是有数据基础的调查，都涉及了大量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在此，我们的立场也不能太模棱两可，我们不会为战争的任何一种解释做调查，而后对其进行仔细推敲。相反，尽管对立的观点认为理论应该先于经验调查而行，但在这里我们寻找一致的经验模式。在我们项目的早期称其为“数一思二”，但这句话要比其相反表达“思一查二”更有帮助。

仅以不成熟的方法处理这些选择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少有人曾经遵循这些专门领域，把研究推向极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研究事业用在问题的两个方向，并相当频繁地在此之间往来反复。我们从各种

8